

55年前我曾走进“红船”

● 马蒋荣

1966年12月下旬,我和四个才15岁的徐汇中学初二(11)班男同学为响应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进行步行串联的号召,商量后决定目的地走到江西井冈山。

说走就走,我们向学校借了一面红旗,买了一张全国地图,向各自邻居中的解放军退伍老兵学习了打军用背包的方法,每人准备了一条小被子两双解放鞋一个水壶一块用来挡雨的塑料布,以及向家长要了5元钱和几斤全国粮票,在当时的徐家汇火车站集合后,就沿着沪杭铁路轨道线出发了。

当时的沪杭铁路,基本上每30到40公里处都在铁道边的小村落附近设置用稻草毛竹竹篾搭成的临时大串联接待点,由附近村里的大妈大伯负责接待像我们这样大串联往来学生的吃住,特别是大量提供洗脸和泡脚热水,还有赤脚医生负责为路上发生小毛小病的同学诊治。而脚上打泡则由大妈帮忙用消毒的针挑破,擦上红药水盖上薄薄的纱布和医用胶带。睡觉则是几十个学生一起睡在厚厚的稻草通铺垫子上。

虽然刚出发的三天我们已经走得非常辛苦疲惫,但在进入铁路嘉兴站后,大家还是一致决定,宁可多走一段路也要到南湖去看一看,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后半程会议是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开会的。

记得当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一早出发不久就按图索骥般地走下了原来走的铁路轨道线,找到了一条通向南湖的简易公路,一路上见到好几批像我们一样赶去南湖的学生队伍。终于走到了南湖,马上在湖边看到了魂牵梦萦的“红船”!顿时我们一行都怀着激动和崇敬的心情,默默地排队等候着上船。等轮到我们一行时,虽然船头跳板处有一位大妈跪着不停地用大毛巾擦拭每个参观者登船后在甲板上留下的湿脚印,但我们五人都自觉地在登船前脱下了满是泥浆的鞋袜,赤脚走上船头,并在大妈的干布上擦干净了脚底后,才轻轻地走进船舱。只见船舱里所有的家具摆设都一尘不染,虽然讲解员说这艘船是复制的,但每个细微处都透着历史的真实和时代的厚重感。在仔细听完讲解员的介绍后,我对红船和建党的历史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下船后,我们在岸上各用了当时几乎可吃一顿饭的1角钱买了一幅《中共一大革命纪念船舱》(即“红船”)的照片,并在照片后请工作人员盖了“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留念”的纪念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前夕,我拿出了这幅已经在



■ 绽放(摄影)

孙逸



刊头书法 江妙春

■ 新时代(篆刻)

陈永春

我的收藏本中整整珍藏了近55年的“红船”照片,仿佛又一次让我重温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的光辉一页。“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留念”照片后盖的纪念戳中八个毛体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说正是这艘载着“星星之火”的“红船”起航,度尽劫波、千难万险,终于逐步发展壮大驶向到今天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领导全中国14亿人民一起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光辉彼岸,实现了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愿景。

《论持久战》从此走向世界

● 马信芳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以便让全世界都能读到这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著作”,中共中央决定把这部著作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这一任务交给了在上海工作的《大公报》驻美记者、中共地下女党员杨刚。

一天,杨刚来到自己的好朋友项美丽(出版家邵洵美的美国籍妻子)位于霞飞路1754弄9号的住所。杨刚知道项美丽一直以来支持中国革命,而且为人善良、热情,故此来到她这里寻求帮助。项美丽一口答应,于是便和杨刚一起开始了翻译工作。遇到吃不准的问题,就请邵洵美帮忙。

邵洵美女儿邵绡红曾撰写的《最初发表“论持久战”英译稿的杂志》一文中较详细地披露了其父邵洵美参与翻译印刷出版这本书的全过程。当时他以美国人项美丽的名义在上海出版了宣传抗日的英文杂志《直言评论》。经过邵洵美和杨刚共同努力,《论持久战》的英文稿终于完成,完成后即分四次在《直言评论》上连载。此后,邵洵美又策划了《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发行。毛泽东知道后,特地写了一篇约1000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

邵洵美很快将该序译为英文。历时两个月,500册《论持久战》英文单行本终于印制完成。为了能让更多的外国人看到,邵洵美开着小轿车,趁着深夜,悄悄地将英文单行本一本一本塞进虹桥路、霞飞路一带外国人住宅区的邮箱中。

《论持久战》英文本的发行,不仅让上海乃至外国尽快了解了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方针,更增强了国人和世界人民抗战的决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指明了方向。

红色弄堂

(节选)

作者 张晓栋

HONG SE LONG TANG

今淮海中路567弄原称新渔阳里,原来与南昌路100弄的老渔阳里是相通的。如本书第一篇《老渔阳里,红色征程的起点》中所介绍的,这两条弄堂都曾叫“铭德里”,有一定的渊源。新渔阳里的建成比老渔阳里晚三年,弄堂口都对着在上海与南京路比肩的重要商业街——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霞飞是法国元帅和军事家。1915年,法租界公董局用他的名字为1906年命名的宝昌路重新命名。宝昌曾任法租界公董局的总董,还曾5次出任公董局董事会董事。但是,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军人更能赢得尊重的时代。这条马路后来还叫过“林森中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大批白俄人逃至上海,入住霞飞路,霞飞路由此繁荣起来,成为法租界最繁华的地段,以致现在一讲到法租界,人们就只知道老卢湾区的淮海中路,却将因法租界而兴起的老黄浦区忘得一干二净。

新渔阳里的弄口就是一个丁字路口,“丁”字的竖钩处即今成都南路。沿着成都南路朝北走,大约三五分钟,便能到达同一年代建造的辅德里。在

1915年时,两处中间还隔着一条长浜,但5年后的1920年,这条长浜被填埋,所以两处走动起来应当十分便捷。而从新渔阳里到老渔阳里,更是只要在弄内穿行即达。这就让人们对于三处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想象。1920年,陈独秀已经入住老渔阳里2号,但李达他们要到第二年才会租下辅德里625号。所以,新渔阳里在1920年只是在弄内向南,与老渔阳里发生关系,而在1921年辅德里成为中共早期的重要办公机构后,新渔阳里则成了老渔阳里和辅德里之间的桥梁。

新渔阳里6号原来是戴季陶的居所。戴在早年间也曾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但稍后即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大浪淘沙,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进来了。年轻人在这里做出人生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建党前的重要人物都在新渔阳里出现过,如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陈独秀等,而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统存、袁振英、叶天底和金家凤更是于1920年8月22日在此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机关也设在这里。

为了掩护这里的革命活动,在1920年9月间,这里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学校的招生广告刊登在1920年9月30日的《民国日报》上,广告的发布者即是新渔阳里6号的新主人杨明斋。

杨明斋生于1882年,1901年即到海参崴打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十月革命前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当时,他受组织委托,培养一批懂得俄文的青年,为组织输送青年干部,外国语学社只是其计划的一部分,但从结果来看却是硕果累累:大约有30多名学生在这里经过学习,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精英骨干,其中包括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王一飞、汪寿华等。但是,此处因革命活动频繁而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于1921年4月29日被查封。

现在,这里已建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新渔阳里,红色青年的舞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